

目 录

引 言 把目光投向赣南和江西客家/ 1

第一章 江西客家研究概述/ 8

一、内地客家研究的复兴和反思/ 9

二、江西客家研究的轫始与发展/ 13

三、江西客家研究的壮大和前进/ 16

四、江西客家研究的成绩、不足与趋势/ 27

第二章 江西客家的历史源流与人口分布/ 35

一、江西的自然历史环境概况/ 35

二、江西境内的土著居民和客家先民/ 38

三、中原汉人南迁与江西客家人的形成和发展/ 45

四、江西客家人的分布与人口/ 56

第三章 江西客家姓氏与宗族社会/ 65

一、江西客家姓氏文化表征/ 65

二、江西客家宗族社会的形成/ 69

三、江西客家宗族社会的表现/ 75

四、宗族结构对江西客家社会的影响/ 87

第四章 江西客家民间信仰/ 99

- 一、江西客家地区民间信仰特点/ 100
- 二、许真君信仰/ 102
- 三、汉帝信仰/ 108
- 四、仙娘信仰/ 113
- 五、水府老爷信仰/ 117

第五章 江西客家风水文化及其传播与影响/ 122

- 一、形势派风水的起源及其与江西客家的关联/ 122
- 二、江西客家风水的主要理论和代表人物/ 127
- 三、江西客家地区的风水活动表征/ 131
- 四、江西客家风水的向外传播与影响/ 141

第六章 江西客家艺文/ 148

- 一、江西客家文学(以赣南为例)/ 148
- 二、江西客家戏剧/ 169

第七章 江西客家民俗/ 181

- 一、生命崇拜民俗/ 181
- 二、大众信仰民俗/ 196
- 三、行为民俗/ 208
- 四、饮宴民俗/ 220

第八章 江西客家民居建筑/ 227

- 一、厅屋组合式民居/ 227
- 二、围屋民居/ 231
- 三、围龙屋民居/ 239



第九章 江西客家古村落与现代嬗变 / 242

一、江西客家古村落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 / 243

二、江西客家古村落的类型学分析 / 247

三、江西客家古村落的典型个案 / 256

四、江西客家古村落的现状与嬗变 / 271

第十章 江西客家英杰 / 277

一、江南第一位宰相——钟绍京 / 277

二、赣南客家办学第一人——温革 / 279

三、陆游最敬重的老师——曾几 / 281

四、文天祥与客家人的抗元 / 283

五、江西山水画派的开派画家——罗牧 / 287

六、才高行独的宁都“三魏” / 289

七、一门四进士的西江“四戴” / 292

八、声震全国的义宁陈氏“四杰” / 294

九、戊戌变法的重要理论家——陈炽 / 300

十、血写工运春秋的英烈——陈赞贤 / 302

十一、《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第一个译者——郭大力 / 304

十二、这里有个将军县 / 308

参考文献 / 311

后 记 / 317

总 序

汉族中的客家民系或曰客家族群,发祥于我国中原大地。由于政治、军事、经济等原因,早从秦汉时起,他们的先人就从中原不断往南迁徙,定居和繁衍于南方各个省(区)。进入近代以后,锁国封关的局面被打破,客家人本其勇于开拓进取、能够吃苦耐劳的精神,漂洋过海、出国谋生者也不少。他们在艰苦的创业过程中,也为居住的省(区)或国家的社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和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以致国权丧失、民族阽危。国难当头,客家儿女又本其热爱祖国、不畏强暴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道,奋起开展反对封建压迫、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在维护民族尊严、争取国家独立、探索国家富强的道路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中外人士的瞩目和赞许。因此,在 19 世纪末年,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对客家问题的关注,到 20 世纪 20 年代及其以后的几十年间,在以罗香林为代表的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开展了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在大陆各个客家省(区),客家联谊社团的组织,客家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世界客属恳亲活动的开展等等,使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

广西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成立于2004年6月,得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赞助。它的宗旨是:加强和海内外客家乡亲以及从事客家研究同道们的联系,为弘扬客家历史文化、增进各族和各国人民的团结、促进祖国建设大业尽心尽力。为此,我们在做好客属日常联谊工作的同时,将在中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以地域、人物和客家历史文化的个案研究为主,组织编写并出版客家研究系列丛书。

一是“客家区域文化”丛书。它以国内的几个客家大省(区)和客家移民较多的国家为基点,以一省(区)、一国一书的形式,分别研究该地客家人的历史和现状,他们与周邻居民的交往、发展、变化以及相互认同等等。通过区域“客情”的调查研究,为了解全国以至世界“客情”创造条件,从而使我们对客家民系的全貌得到比较真实和全面的认识。

二是“客家著名人物”丛书。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当代,涌现出不少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领域的著名客家人物,他们或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国际交往中,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乃至宝贵的生命,为祖国的独立富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研究并为他们分别立传,目的是为后来者树立榜样,奋发向前。

三是“客家文化综论”丛书。客家历史文化的许多重大问题,学界已经作过不少研究。但是,当代社会正处于全面变革的进程中,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日益频繁,彼此吸纳无所不在,因此,我们对客家的研究也必须与时俱进,以文献资料与社会调查相结合,以理论创新与研究方法创新相结合,综论客家文化的重大问题,既看到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本,又理出客家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在对外交往中出现的新事物,使我们的研究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三套丛书,归宗于“客家研究”一个大课题。我们希望: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客家文化资源,拓宽研究视野,深入问题探索;立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努力写出课题新意,使研究成果具有自己的特色。我们深信:有广西师范大学领导的关怀和指导,有海内外客家乡亲和我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通过各方同道的共同努力,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开展交流和讨论,就可以逐步取得对问题的真实理解,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好的现实意义。

我们的工作正在起步。瞻望未来,任重道远。我们将努力以赴,做好工作。谨以至诚,祈求方家和读者朋友们的及时批评和指导。

“客家研究丛书”
总主编 钟文典
2004年10月28日



引 言 把目光投向赣南与江西客家

客家研究肇始于 19 世纪中期,以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的问世为标志,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此后,由于历史、社会、政治等原因,客家研究在大陆受到了冷落,几乎成为空白。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客家研究再次兴起,引发为一种“客家热”,并逐渐升温,成为学术界重视的一门显学,客家研究进入第二个发展高潮。特别是在海外客属团体与客籍华侨华人的推动下,各种客家联谊会、研究会等机构相继建立,学术会议、文章论著也推陈出新。此外,以客家为主题的恳亲会、文化节、联谊会、经贸洽谈会等活动此起彼伏,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媒体纷纷刊载,频频报道。“客家”似乎在一夜之间陡然如雨后春笋,为越来越多的世人所知晓、所熟悉。在这种声势浩大、热闹非凡的浪潮之下,客家研究成绩显著,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不同客家区域研究的失衡就是其中之一。

客家研究的知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东博士在为罗勇教授的《客家赣州》一书所写的书评中曾这样说道:“在赣南、闽西和粤东这三个客家人主要聚居地之中,赣南尽管以其众多的客家人口及保留完整的

客家文化,被誉为了解客家、体验客家的最理想的基地,但在社会范围之内,它显然受到了一定的冷落,以至于在一般公众心目中,但凡言及客家,必称闽粤。这就使得赣南客家人在相当程度上‘失语’,从而造成赣州这一目前国内最大的客家聚居地‘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尴尬局面。长此以往,后果必将是社会公众对作为客家‘摇篮’之一的赣南地区的淡漠,并间接导致赣南客家人因社会认同的缺失而带来的身份危机。这种状况一旦出现,就将从根本上动摇客家研究的立足点和生长点,无疑将是客家研究的灭顶之灾。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对罗勇《客家赣州》的认识,也将更深一层。”^①王东此言,其意有二:一是对当下以赣南为代表的江西客家研究“落后”、“迟滞”局面的失望,二是对客家研究的区域性发展不平衡的担忧。

^①王东:《历史普及与地区认同——从历史学角度评罗勇《客家赣州》》,《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2)。

江西,是一片神奇的红土地,它地域广袤、历史悠久、底蕴厚重、文化多样,在我国社会历史和区域文化研究中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尤其是赣南地区,是开展区域社会史和客家族群研究的“试验地”、“资料库”。众所周知,赣南、粤东和闽西是客家人的大本营和文化中心,赣南由于历史、地形等因素影响所致,在整个客家人的族群历史和文化中有特殊地位。

赣南是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目前,对于客家人源于何时、成于何代尚无定论,但不论哪一说,赣州都以其“南控北越,北达三江”、“据五岭之要会,扼粤闽之要冲”的优越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水路交通及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南迁客家先民的最早接纳地之一,这是不容置疑的。赣南是客家人当今最大的聚居地。目前,赣南(赣州市)面积3.94万平方千米,下辖18个县(市、区),除赣州市区和信丰县城以外,其余17个县(市)均为纯客家县(市)。无论是客家人口,还是地域面积,赣南都是客家人最大的聚居地。赣南是客家人的摇篮。赣南作为客家文化、客家民系形成的摇篮,在客家文化、客家民系的成熟期,与闽西、粤东一样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对此,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取向曾给予了较大的关注。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梁洪生教授就曾撰写专文,对赣南的地方历史研究的队伍力量、研究内容、学术成就以及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回顾和总结。也正缘于区域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赣南乃至江西开展客家文化研究,无疑独具历史人

文和地理优势。

江西客家的研究乃是承继 20 世纪 80 年代初重新兴起的大陆客家学热潮而发展起来的。相比粤东和闽西,江西客家研究总的来说开展较晚,初期只有零散的研究。1991 年在上海举办首届客家会议以后,江西客家研究才开始正式走上快车道,不断推陈出新、疾步前行,逐渐形成以南昌和赣州为中心的“一北一南”这两大江西客家研究阵营和格局态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江西客家研究的“北派”,逐渐式微,唯剩下“南派”独力支撑,因此成就了赣南客家研究一枝独秀的局面。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赣南客家研究成绩显著,发展迅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赣南师范学院也成为内地客家地区首个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单位,客家研究也被纳入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之中。

王东先生上述关于赣南客家人与客家研究的评论,联系整个海内外的“客家热潮”加以分析,从中又可读出几层含义。一方面,赣南客家的声势与影响固然不及闽粤,故而江西客家人会“失语”、“养在深闺人未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客家”这一话语在江西还是炙手可热的。只不过江西客家的“热”,不是那种基于闽粤普通客家民众自觉的族群意识和文化认同意义上的“客家情潮”,也因缺乏闽粤客家地区的海外华人华侨优势,故而没有强烈的招商引资、联谊恳亲的“客家商潮”,更不像台湾客家民众那种诉求政治权力、社会地位的“客家运动潮”。江西客家热,主要是“客家研究热”,或者说是一种“客家学潮”。另一方面,江西客家研究的发展与壮大,特别是近年来江西客家研究工作以及所取得的成绩可谓有目共睹。

近年来,区域研究蓬勃兴起,无论是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还是新兴的交叉学科,都已蔚然成为一种新趋势,颇具方兴未艾与蒸蒸日上之势。后现代人类学以地域文化挑战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大叙事理论”、“总规律”的认识,认为文化的根本价值在于它的地域性,甚至认为世界上没有“大文化”、“总文化”,只有地域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有着与“区域”相近或相似的概念,如社区、聚落、文化区,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区域是由人组成的,人是具有文化的。按照萨林斯的看法,每一人群均有自己的文化,每一人群的历史表达均由自己文化的“历史性”决定,也就是他所

提出的“文化界定历史”。不同民族、不同族群的人各自有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客观的历史过程与这些民族、族群各自的历史理解是不一致的。透过对不同人群的历史的研究,可以深入地认识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因此区域研究,除了要注重该区域的社会历史以外,更要密切关注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主体——人群或族群。区域研究的人类学视角或转向,最根本的还在于作为学科意义上的人文关怀,也就是对区域民众的关心、关怀,从普通民众的日常文化生活出发,引入人类学的个案研究方法。具体到赣客区域,自然不可忽视或绕过客家,否则很多问题就说不清楚。这也正是作者所主张的从“赣南客家”到“客家赣南”,从“江西客家”到“客家江西”的缘由所在。

在某种意义上,当前的江西客家研究学者大体可归为本土民族志学者,本土与本土居民是民族志学者转向其自身的研究客体 and 对象。虽说“在地客家”特色是研究主轴,然而以“赣南地区”为范畴之赣南客家研究却并不能以“赣南”地域和“客家”族群为限。江西客家研究若要进一步发展,取得更大成绩,应在坚持既有的在地研究的基础上,赋以区域研究在人类学知识体系建构上的意义,实现在理论视野和学术话语上从“赣南客家”到“客家赣南”的转变,在研究区域上从“赣南研究”到“超越赣南”或“走出赣南”的跨越。

在当前人类学知识体系中,田野研究正在发生着巨大的重构,这对客家研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人类学的田野重构,实际是对区域概念的反思,无论是从行政区域、社会经济区域到文化区域、感觉文化区域的区域类型学划分,还是从施坚雅基于市场贸易的经济区域到从民间信仰角度发展出的“祭祀圈”、“信仰圈”范式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区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学概念。近年来具有明显历史人类学倾向的中外学者对区域概念进行了深入反思,认为“区域是一种历史建构”^①,强调研究者不能拘泥于僵化的时间及地理界限,而应以人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这种观点对客家研究的深化很具启发性。区域概念反思的一大表征,就是田野地点的扩大。人类学田野地点的扩大,在于作为研究地点和对象的“田野”不应局限于有着明确地理边界的空间、地域单元。从族群和区域文化角度来看,赣南历史与文化显然是大客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江西客家研究学者不应作茧自缚,过于专注“赣南”

^① David Faure and Helen Siu.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这个地理区域和学术圈子,忽略与“赣南”紧密相连的赣中、赣西北等地,无形中削弱自身的丰富内涵,束缚自己的手脚。对于赣西北和赣中等客家地区的忽略,不仅是文化区域本身的问题,还是行政区域、制度区域、学术区域所导致的问题。上述两个客家地区都没有专门的客家研究的学术机构,同时又不如粤东闽西赣南的地位重要,因而没有引起其他学者的重视,从而导致研究上的缺失。作为族群的“客家”,它是离散的,在空间上是割裂的或分离的,例如大陆原乡客家与海外客家、客家大本营与迁居客家。在客家迁徙史上,江西客家地区的“新客家”、“老客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新客”和“老客”的对比研究,就需要多点民族志或多地点的田野调查。这也是江西客家研究今后值得努力的方向。

江西客家研究的跨越和突破,一是要从历史研究单位的合理定位入手,坚持在地研究与离散视野的结合。“客”是一个包括地域在内的族群概念,作为一个文化单元加以研究本无可,但问题在于,在客家这个大地域、大文化、大族群概念中,包含着赣南、闽西、粤东、台湾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和地方社会,如果不顾这种差别,不加分析地把它们一起纳入“客家文化”这个框架中,就不利于江西客家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把文化上各具特色、自成单元的区域文化与地方社会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应该是我们客家研究的基本依据,赣南亦不例外。但我们在承认以赣南作为区域文化研究单位合理性的同时,又应把视野扩大,不要画地为牢,应以赣南为核心,客家文化为主体。

以族群面向而言,尽管客家是研究包括赣南在内的客家区域社会历史的主要内容,但又非全部,而是解析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和关键词。畲族人、操西南官话的赣州人、彼此间之融摄激荡历程等尚有许多可以探讨的部分。再以研究内容而言,赣南地区举凡乡村社会、民间信仰、民间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农民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留守儿童等领域,皆可以深入进行质性研究。陈春声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客家学”本身成为一种“塑造历史”的过程,不具有“族群”和“文化”问题的课题在“客家”研究中被弱化,经济、贸易等非常值得重视的方面也被弱化。^①凡此,皆须长期研究,应鼓励从“赣南研究”到“超越赣南”和“走出赣南”或“走出客家”的转变。

江西客家研究的跨越和突破,二是要把客家问题和区域研究方法结

^① 陈春声:《客家研究与教育圆桌会议纪要》,《客家研究辑刊》2006(2)。

合起来,把人类学的族群和区域文化与历史学的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视野统合起来,期望能从地方社会研究中发展出一套新的客家研究的话语,建立新的客家研究范式和历史解释体系。^①应努力把传统客家社会研究中的人类学、历史学等多种学术风格结合起来,通过实证的、具体的研究,努力把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国家制度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个案的、区域的研究置于对整体历史的关怀之中,注意从客家历史的实际和客家人的意识出发理解传统客家社会历史现象,从不同地区移民、拓殖、身份与族群关系等方面重新审视传统客家社会的国家认同,又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国家制度和国家观念出发理解具体地域中“地方性知识”与“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

^① 周建新:《客家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思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4)。

客家学研究旨趣与区域社会史研究旨趣,既有不同,又相得益彰。近年来一批在省外攻读或工作的江西籍学子,虽然并不是以“客家”为主业,“客家族群和文化”也不是他们论文所关注的主要研究对象,然而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在探讨赣南乃至江西地方社会时兼及客家,而且是将“客家”置于赣南的地方社会和历史这样一个平台上进行分析和理解。这种研究路径恰恰是跳出“客家”谈“客家”,提供了理解江西客家的新视角,也让人们认识到对赣南、对江西不能只有一种“客家地区”、“客家文化”的思路。这种将客家文化置于地方社会的框架的研究取向,是赣南客家研究的一大特点和突出亮点,也是今后江西客家研究发展的一个重大方向。如饶伟新通过对清代以来的“客籍”与近代以来的“客家”的考辨,认为两者是不同时代环境和语境下的产物,不可相提并论,“这种历史关联不是一个简单的由‘客籍’到‘客家’的历史继承或转化关系,也不是一个从他称到自称的转变关系”。因此饶伟新认为,“对‘客家’称谓由来问题的讨论,应该打破‘起源偶像’,放弃以往客家学界迷恋于历史文献中带有‘客’字的历史称谓的历史溯源之讨论模式,把目光转向客家地区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动态的历史变迁过程(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过程),从中考察和探究近代‘客家’民系的起源背景和形成的历史机制,这或许可以为‘客家’的研究开创新的视野,丰富和深化对今日客家社会历史文化的认识”。^②反过来,“赣南客家”、“江西客家”研究又可以促进对赣南和整个江西地方历史的理解,构建起以“以客家为中

^② 饶伟新:《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客家”称谓由来考论——以清代以来赣南的‘客佃’、‘客籍’与‘客家’为例》,《民族研究》,2005(6)。

心的”区域社会史解释模式。

作为客家区域文化研究丛书的一部,本书以历史与现今江西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为论述对象,承载着向世人介绍、宣传江西客家,展现江西客家文化的绚丽多姿的重任。本书主体内容共分十章,第一章为江西客家研究历史与现状的概述,第二章介绍与探讨了江西客家的历史源流与人口分布,第三章到第十章分别介绍了江西客家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姓氏宗族、民间信仰、风水文化、文学艺术、民间风俗、民居建筑、古村落、名人英杰。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尝试将人类学的族群和区域文化与历史学的区域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理念付诸实践,然而考虑到本套丛书的主旨目标以及体例的统一性,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囿,这个设想未必能够完全实现,权当是引玉之砖,希望能引发更多学者对于客家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更深入的讨论,为客家学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

“把目光投向赣南与江西客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向学界同人发出的共同研究赣南与江西客家社会文化的真挚请求,也是江西丰富的客家文化资源客观呈现的迫切需要。我们希冀以此为一个新的起点,借由学科的整合与深化,提供新视野与新思路,接轨于世界学术之林,开启江西乃至全球客家研究新里程。

第一章 江西客家研究概述

客家是我国汉族的一个重要支系。自 19 世纪初起,客家就开始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客家之所以引起世人的重视,主要缘于几件至今令人犹感震惊和苦涩的历史事件。一是清朝中叶的土客冲突。明末清初,闽粤客家人因人地矛盾突出,不断迁居广府、潮汕地区。因语言、习俗等不同,特别是由于耕地、山林和水源之争,土著居民与客家人之间经常产生矛盾,在广东的中西部地区酿成长达十余年、死伤百万的大械斗,史称“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时人徐旭曾撰《丰湖杂记》,以发生于东莞、博罗境内的土客械斗为原由叙谈客家人的来源和风俗。二是太平天国起义。由于此次起义的领导和参与者大多为客家人,中外人士为之侧目,特别是一些外国传教士更是积极投身于客家研究。三是 20 世纪初期客家人针对强加其身的“客贱”、“非汉种”等污蔑之词而奋起驳斥和反抗。他们组织成立了“客家源流研究会”、“客家源流调查会”,创办《大同日报》等,黄遵宪、丘逢甲、邹鲁、温仲和等人著文立说,驳斥谬误。其集大成者首推罗香林,他撰写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等书,对于消除历史误会,缓和土客矛盾,弘扬客家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他提出的客



家源流、形成以及族群属性等观点,奠定了客家研究的基础。此后,由于历史、社会、政治等原因,客家研究在内地受到了冷落,几乎形成空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客家研究再次兴起,并成为—种“客家热”逐渐升温,成为海内外学术界重视的—门显学。江西客家研究就是由内地客家研究复兴浪潮引发和催生的。要了解江西客家研究的发生和发展,自然要简要回顾—下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内地客家研究复兴的总体情形。

—、内地客家研究的复兴和反思

20 世纪 50 年代,内地客家研究开始沉寂,此期海外客家研究却保持—定的力度,特别是一批英美人类学家在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研究最为活跃,他们在研究内容与方法上注重人类学范式的调查研究。如 M. Freedman(弗里德曼)、H. D. R. Baker(贝克)、B. E. Ward(华德)、C. F. Blake(布莱克)、J. M. Potter(波特)、J. Waston & R. S. Watson(华琛夫妇)、David Fauture(科大卫)等人在香港新界等地对客家村落进行的研究,又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Myron Cohen(孔迈隆)在台湾屏东县美浓客家地区的调查研究。关于香港和台湾地区客家研究状况,已有学者作过较全面的总结和述评,此不赘述,可参见谢剑的《香港地区的客家研究及其影响》和陈运栋的《台湾客家研究的考察》等文。^①改革开放以后,客家研究重新在内地兴起。与以往研究相比,新一轮客家研究热潮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特点:

第—,—大批研究论著和丛书出版。张卫东、王洪友主编的《客家文化》(1989),刘佐泉的《客家历史与文化》(1991),房学嘉的《客家源流探奥》(1992),饶任坤、卢斯飞的《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1993),谢重光的《客家源流新探》(1995)、《客家文化与妇女生活——12 至 20 世纪客家妇女研究》(2005),李泳集的《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1996),王东的《客家学导论》(1996),陈支平的《客家源流新论》(1997),胡希张等的《客家风华》(1997),谢剑、房学嘉的《围不住的围龙屋——记—个客家宗族的复苏》(1999),何国强的《围屋里的宗族社会——广东客

^①徐正光主编:《第四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8。

家族群生计模式研究》(2003),刘晓春的《象征与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力与记忆》(2003),罗勇的《客家赣州》(2004),钟俊昆的《客家文化与客家文学》(2004),刘大可的《传统的客家社会与文化》(2001),罗可群的《广东客家文学史》(2000),刘丽川的《深圳客家研究》(2002),吴永章的《客家传统文化概说》(2000),谭元亨的《客家圣典》(2004),杨彦杰的《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1996),周建新的《动荡的围龙屋——一个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与文化抗争》(2006)等一大批重要的客家研究论著出版。与此同时,有关客家研究的丛书也相继推出,据粗略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开出版的较重要的客家丛书已有一二十种之多。如国际客家学会、法国远东学院、海外华人研究社联合出版的《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目前已出版30卷),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客家文化丛书》(10册),广西教育出版社的《客家研究丛书》(3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四川客家文化研究丛书》(3册),花城出版社的《客家学丛书》(6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客家研究文丛》(10册)、《客家研究文丛·客家与梅州书系》(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客家区域文化丛书》(5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客家社会与文化研究丛书》(已出版7册,尚有8册正在出版中)等。

第二,研究机构增多。以大陆地区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客家研究机构已经遍布于客家大本营的粤闽赣三省以及北京、上海等地,有代表性的是深圳大学中国客家研究会、华东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现扩展为客家研究院)、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所(现扩展为客家研究院)、江西师范大学客家研究所、福建社会科学院客家研究中心、福建龙岩学院客家研究所等。进入21世纪,客家研究机构逐渐增多,先后成立的有四川社会科学院客家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家研究所、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客家研究所等。

第三,研究内容拓展。除客家渊源、客家方言、客家妇女等方面外,有关客家传统墟市经济与现代化、客家乡村社会变迁、客家民间宗教、客家海外移民与原乡社会等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此外,还特别注重客家内部的差别以及客家与其他族群的比较分析,例如粤东、闽西、赣南这三块客家最集中区域内部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原因分析,又如客家文化



与赣文化、客家文化与广府文化、客家人与潮汕人的比较。

第四,研究方法多样化。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以外,目前客家研究愈加重视多学科知识的引进与运用,并在具体研究中加以整合,如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成为客家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工具。与此相对应的是,客家研究的学术交流在保留原有的以客家为主题的理论性的学术研讨会以外,以田野考察报告会的形式的客家会议也先后在广东梅州、韶关以及福建龙岩、江西赣州举办了9届。此外,在族群理论、华南社会、民间信仰、海外移民等学术研讨会上,有关客家研究方面的学者与提交的论文也占有不小的分量,使学术界对客家研究日益关注。

第五,不同身份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参与。近年来,随着客家研究的升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把目光转向客家。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地非客家籍贯的学者加入了客家研究阵营,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种非客籍人士的“加盟”,改变了以往客家人研究客家的单一局面,有利于客家研究朝着更加客观、更加理性的方向前进。二是海内外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加入,特别是不少在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前往内地客家地区调查研究,将客家文化作为他们的学位论文的选题。

如上所述,经过一大批学者的努力钻研和辛勤耕耘,内地客家研究业已取得丰硕成果,成为一股日益蓬勃的研究热潮,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热点。然而,在这种热潮、热闹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少问题,暴露出诸多不足和缺陷。

首先是强烈的中原情结。客家的中原情结或心态,是客家人强烈的族群意识的体现,也是客家在“中心—边缘—中心”挣扎的一种心路历程,是对中原的正统地位的攀附与回归。当客家人被视为“獠”、“匪”的时候,客家人最需要的是将自己与中原汉文化之间建立起正宗的联系。华夷之分的观念与四个中心——帝王中心、中原中心、汉族中心和儒家中心密切相关。这四个中心之中,只有“中原中心”是硬件,因其地理位置不容改变,其他三中心是软件,因此可为有意图者所编造和杜撰。这使历史上的依附的中原正统认同成为可能。被誉为“中原古汉语活化石”的客家话,根源在中原的堂号堂联、谱牒记述的衣冠南渡、聚族而居讲究宗法伦理的宗祠民居等一系列文化符号,以及崇正爱国的精神、强